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国研究

A Multinational Study

相蓝欣◎著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

K256.707/6

相蓝欣◎著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相蓝欣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 7-5617-3617-7

I.义… II.相… III.义和团运动-研究
IV.K256.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779 号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著者 相蓝欣
策划组稿 周洁
责任编辑 张哲永
责任校对 李雯燕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865537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 开
印张 25.75
字数 337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
印数 1-5 100
书号 ISBN 7-5617-3617-7/K·239
定价 39.8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相蓝欣

1956年生于南京，祖籍北京市。1974年初到1978年初在安徽淮海郭庄大队插队落户四年整。1978年2月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获欧洲和北大西洋关系研究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美欧关系专家戴维·卡莱欧教授。曾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去耶鲁大学任国际战略与安全项目奥林博士后研究员。在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一年，并在美国任教五年。现任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亨利·基辛格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曾出版英文著作三部：《重建帝国主义远东》（1995）、《毛泽东的将军们》（1998）和《义和团战争的起源》（2003）。此外还发表过多篇关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文章。目前在美国担任基辛格讲座教授，期间写作《中美关系中的民主理念的历史哲学思考——兼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优势》一书。



ADA86/08

前 言

我为何要再写一本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呢？关于这个题目的流行著作自1900年以后已出了不少。同时，针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似乎已有大量的学术著作、回忆录和日记加以广泛的叙述。尽管如此，一个多世纪已经逝去，关于义和团战争的来龙去脉仍未被说清楚。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很少有像义和团事件那样受到了如此众多的神秘主义者和学术界专家们的青睐。保罗·柯文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很有趣的著作：《历史三调：义和团作为一个事件，一种经历，以及一个神话》，柯文的讨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与他的争执在于我认为他的第一调，即历史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尚处于待定状态。在所谓“义和团研究”的学术领域内，迄今存在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调所谓“义和团暴动”，而对“义和团战争”本身则多由流行作家，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来关注。

这个题目花了我近十年的功夫。在研究了9个国家，再加上中国的史料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要使传闻式的这段历史成为信史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上的理解与语言上的能力只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主要障碍。我本意是在2000年，即义和团事件百周年之际

出版一本关于它的全史。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卷入这一事件，而大量的一手原始材料几乎未被学者动用过，要寻找起来和梳理清楚颇为困难。在本书中，我只能将此事件叙述一半，而且未必很成功，也就是说我只讨论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即到1900年6月20日为止，当时清廷已决定宣战，臭名昭著的围攻使馆事件亦已开始。当然，恰恰是这场战争的起源最扑朔迷离和令人费解，战事本身倒是相对有迹可寻，不难理解。

我对“义和团研究”这一领域中迄今为止的中外著作的最大不满是文化上的偏激观点充斥其中。英美世界的著作往往倾向于贬低他国他民族在该事件中的表现，同样，他国的著作也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多有诋毁和中伤。那些在围攻使馆事件中幸存的外国人则多在战后相互指责对方应对这一悲剧负责，传教士们抱怨外交官的傲慢，而外交官却反过来指责传教士是祸源之首，驻华新闻记者对双方均有微词。那些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者用“黄祸”眼光来看这一事件，而那些受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影响的中国研究专家则反唇相讥，指出“黄祸论”实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总之，在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中至今缺乏一种超脱、公平和跨国度的著作。

当然，我们不必要对文化偏见的存在大吃一惊。在英语世界里，早在1901年伦敦街头就上演过木偶活报剧，将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描绘成一个懦夫。而1959年好莱坞的经典巨片《北京五十五天》，将查尔顿·赫斯顿（饰演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和大卫·尼文（饰演英国公使）描绘成55天使馆被围中仅有的两位英雄。在非英语国家里，让·马必尔的流行名著《北京的血红色的夏季》（1978年法文出版），或者赫尔曼·施莱伯的小说《北京的受害者：克林德公使之死》（1936年德文版）则对英美人士的表现不敢恭维。这类文化偏见在各种文字的数百种回忆录里，以及大量的当事人战后出版的日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的研究，相当一批所谓“日记”是在使馆解围后添加甚至杜撰的，只要这个事件的来龙去

脉仍然是个谜,个人情感仍将占上风,文化偏见的怪影将挥之不去。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存在于几种因素之中,首先是满清政府在睿智的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出现内在的权力失衡,其次是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再者,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清王朝的“百日维新”以悲剧和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年轻的锐意改革的光绪虽未被黜,但帝号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旱涝灾害肆虐华北地区,而谋立光绪接班人的危机开始危及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以上这些因素中当然都含有义和团战争起源的线索。但是一般人都忽略这样一个史实:义和团战争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即由一个国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常例,但中国以一国向世界所有的强国开战则是特例。这种做法非但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期历史不合拍,而且与中国古老传统的联盟外交哲学相脱节。此外,还有史无前例的围攻使馆行动,这与以礼仪之邦闻名的中国传统伦理大相径庭。

1900年以来,对这场战争的起源有好几种假设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基本思路。

第一种基本思路在西方最流行的是文明冲突论。按照这个理论,义和团战争是中国落后文化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是一场落后与先进、“中世纪”对抗现代化,以及异教徒抵制基督教文化的冲突。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要欣赏一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画家茹尔根·科那克福斯的代表作《黄祸》便一目了然。

然而,1900年战后的几十年中,这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者的地位大降,“黄祸论”也开始失去市场,学术界对此论已不能接受。遗憾的是,我认为“黄祸论”又开始以其相反的面貌出现,很多学者为了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论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上,从而忽略了对这场战争起源的研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官方学者得以搜

集和编纂大批原始档案史料,从而大大刺激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原本令人生畏的“拳匪”得到平反昭雪。应当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本身完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多卷本著作《剑桥中国近代史》未能就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提供任何系统的解释。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在中国山东义和团研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基本上不提这个事件的关键一段历史,即1900年的春夏时期。英国学者维克多·普赛尔的《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在义和团究竟是反清还是保清的问题上则模棱两可,不敢下判断。美籍华人切斯特·陈的著作《义和团大悲剧》虽然讨论了中方的某些考虑,但其所用的史料属最早由翦伯赞等人搜集的一批,早已过时。同时,陈的书对列强各国政府的外交及内政更缺乏了解,基本没有采用国外的史料。上述的这些最主要的研究都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接触面太窄,当然难以有说服力。我以为,义和团运动本身很难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相比之下,列强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这段时期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种种误解恐怕更能说明问题。

显而易见,围绕这个事件的种种谜团能够一直吸引学者和流行作家是不足为怪的。流行作家的兴趣主要在外国人如何经历和看待这个事件,而学者则往往从关注中方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历史事件。这种约定俗成的“分工”尽管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实际上正是多年来持续制造新的谜团的根源所在。其实,整个义和团事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流行作家特别热衷于将中方的态度和行为神秘化,中国政治深不可测,玄妙无解,这样就比较容易将1900年的中国描绘成一种典型的野蛮落后的国度,从而为文明人如何在野蛮环境下生存的主题提供了最佳历史场景。学者则为义和团的神秘主义的行为和信仰如醉如痴,而对外国人在华的行为不感兴趣,认为与其研究的主题无甚关联。因此,迄今为止,除了极少几部关于双边关系的著作对两方面均有涉及,例如爱德蒙·威勒的《英国、中国与反洋教运动》,其他还没有出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全面研究的成果。事实上,对

中外的两个视角绝不可以分开来研究。如果将两块拼板合二而一，迷雾即可散去。其实，清政府在传统上对任何农民起义必定是要镇压的，而这一传统最终被鼓励义和团运动的奇怪政策所取代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清廷最高当局在1900年春夏之际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取向也无神秘可言。从逻辑上可作如下解释：清廷违反传统的内外政策的行为只能由外来因素，也就是说由外界的威胁所产生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祸论”还不能轻易地被忽略，“黄祸”情感确实对列强驻华使节和各国的政治家有重大影响。它能解释德皇威廉二世的变幻无常的行为，它也能解释日本政府和外交官在同样面临“黄祸论”的心理困境下只能有意识地保持沉默，并在1900年上半年的关键阶段无所作为，在阻止战争爆发的过程中难以发挥作用。它更能证明列强的对华外交实际上由欧洲大国政治所左右。如果仅将反“黄祸论”的情感变为赞扬义和团运动的工具，很多立足于文明冲突的学者的研究就偏离了正题，他们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而未能解决义和团战争的起源问题：(1)由于存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单一起因的论点而不能自圆其说；(2)前后逻辑上不能一以贯之。

第二种基本思路是将战争起源直接怪罪于在华的当事人，主要是指传教士和外交官。但这种流行观点的出发点是认为传教士过于嚣张，而外交官则愚昧无知，此论在流行作家中相当普遍。特别见诸于乔治·斯泰格、保罗·克力门斯、维克多·普赛尔、彼得·弗莱明、里查德·奥康诺尔、埃格伯·基泽和让·马比尔等人的著作中。诚然，在义和团事件的初始阶段，传教士所起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的。但究竟是何种作用还缺乏细致的研究。围攻使馆事件的幸存者之一，奥匈帝国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阿图尔·冯·罗斯通医生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也会参加义和团。”尽管如此，将战争起源的总体完全归罪于传教士是不公平的。

外交官的作用常常被流行作家们大加鞭笞和嘲笑。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外交官对即将到来的仇外大屠杀毫无预感，对现实的危险视而不见。因此，那些对危险有高度警觉的人们的看法，特别是对

传教士的看法反而是正确的。这种观点与上述对传教士的批评一样不着边际,因为清政府并无仇外大屠杀的恐怖计划。应该说,任何政府对外开战的决策都是政治与外交的决策,历史上绝少有政治领袖视开战为儿戏的。就义和团战争而言,清廷的开战决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多国决策过程之间的互动,列强政府和清廷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列强在华外交官的行为却与“谨慎”两字相去甚远。

第三种基本思路源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这个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争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武装冲突。此论在过去的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曾十分流行,在西方也有不少支持者。当然,如果义和团战争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此论或可成立。事实正相反,这场冲突以中国为一方,而以西方主要列强为另一方。更有甚者,中国的一些教科书曾将它描述为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英勇壮举,而清廷迫于人民压力也进行了反抗,这种说法则根本站不住脚。

上述三种大的思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均假设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义和团运动最先启动战争风云,满清权贵为仇洋而开战,而列强之间的争斗也难免一战。因此,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以为,将这三种说法糅合在一起,就可全面地解释这场战争了。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同时向11个列强宣战?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清廷大规模屠杀洋人计划的任何证据。因此,清廷在和战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只能说明宣战者太弱而不是太强。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开战的最后关头仍然举棋不定,开战决定实际上是被动的。此外,正式开战诏书所用的奇怪的语言也与国际公法不合:既不指明某个国家,又不说明开战的具体原由,只是抽象地宣布中国愿意接受外人的挑战。所以这个宣战诏书最多只能算是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外交照会,尽管其措辞极为强硬。笔者认为,此诏书本意在恫吓与威慑,不在开战。

当然,慈禧太后究竟如何默许“拳乱”的政策很难被证实,因为她没有留下私人文件,但这不等于说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永远是个不解

之谜。我们可以围绕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寻找证据以力图得出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解释,慈禧本人和大批的高官都曾确认清廷在这一阶段的政策受假想的外来威胁所主导。问题是这种说法是否可信?^①

在联军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主导思想是恢复在华的均势。即使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敢抱有瓜分中国的野心。各国的档案史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列强曾计划以瓜分非洲的方式来肢解中国。此外,各国政府在1900年上半年都力图阻止中外冲突的升级,那么如何解释这一时期的失控局面,从而在华北导致一场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的荒谬的战争,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多年来,我努力下工夫掌握这场战争中有关国家的所有语言,但未能掌握俄文。在此,我深切怀念一位年轻的俄国史学家、圣·彼得堡大学的教授维克多·布特涅夫斯基。他几年前不幸英年早逝。十年前我俩同是耶鲁大学的奥林博士后研究员,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参加军事史研究项目,在纽黑文我们同住的公寓里,维克多向我介绍了大量的俄文文献,这些文献对本书的第二部,即战争过程本身更有用,我在此对维克多的友谊和耐心表示深深的怀念。

本书作者相蓝欣:

日内瓦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

(英国 Rout Ledge Curzon 出版社 2003 年 2 月出版)

^①关于慈禧太后和其他清廷高官的说法与详细分析,见本书第十一章。

序 幕 —— 神秘的车队

1917年秋。中国甘肃的古丝绸之路上，一支神秘的大车队出现在地平线上。几十匹骆驼拉着大车，车上装满行李，坐着妇女和儿童。在车队前开道的是一乘八抬大轿，显示出一个迅速消失的时代的舒适与安逸。在车队最后，一辆无篷大车拉着一具巨大的棺材，一队武装士兵在两边护卫。这个奇怪的车队在中国大西北的荒野上投下一条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子，与如血的残阳相互照映。

更奇怪的是，整个车队插了许多雪白的方块旗帜，上书“回京就医”。而中央的一面大旗赫然写着一个大字“端”，在“端”字两旁有中华民国各地方政府的通行大印。大道上的过客不免驻足观望，但无人知晓“回京就医”是何官何人，更无人懂得“端”字为何意。

没有人意识到车队的主人曾经一度是中国最有权势，也是西方列强最为痛恨的男子，这正是端郡王载漪（1856—1922）。西方人认为他是17年前爆发的义和团战争的罪魁祸首。端郡王是道光皇帝的孙子，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堂兄。端郡王在上一世纪末突然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只有一个原因：他的福晋是桂祥的女儿，而桂祥是西太后慈禧的弟弟。端郡王从小好吃懒

做且刚愎自用，西太后对他并不喜欢。只是到了他42岁时，由于清朝廷在1898年“百日维新”后产生的政治危机，才突然把他推向了最高权力中心。当时，西太后迫于清代传统不能废黜光绪帝，尽管光绪之母是西太后的妹妹，她还是在1900年初决定立准皇储——“大阿哥”。入选“大阿哥”的正是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所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端郡王载漪获取了包括军机大臣和主管中国准外交部——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等核心位置。重权在握的端郡王一开始就劝说西太后将洋人全部赶出中国，因为洋人对这种变相的废帝阴谋持敌对态度。这就是义和团战争和围攻使馆这个举动的起始原因。战后，八国联军统帅部确认端郡王为祸首，并根据《庚子协定》，于1900年末把他流放到大西北。

眼下，清王朝已被铲除，流放中的端郡王载漪决定携家返京，这是1900年以来的第一次。载漪申请回北京的借口是就医，并将长子溥儀的遗体运回祖坟安葬。溥儀是一个月前去世的，他不是1900年的那个准皇储“大阿哥”。准皇储“大阿哥”溥儀是端郡王的次子，当时被流放在蒙古。端郡王此行的卫队由前清武卫军军官刘连成率领。刘连成当年供职于《庚子协定》中确认的另一名罪魁、董福祥将军的部下。董福祥以仇外出名，围攻使馆即主要由董军所为。在八国联军北京占领军统帅部的罪犯名单上，端郡王和他的排名最前，有所谓“端一，董二”之说。然而，这两人都未被处以极刑。董回到老家甘肃固原，数年后即去世。

令端郡王载漪又惊又喜的是，北京的民国政府非常合作，回京的批文很快下发。更使他吃惊的是，沿途一路上，端郡王和其家眷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些名为民国政府的地方大员都以邀请端郡王赴宴为荣，并挑选上等旅馆供其一家居住。对共和政治茫然无知的端郡王当然不能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现象之下的潜流。其时，正如当时的知识界精英鲁迅在其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守旧派对毫无章法的民国政治厌烦已极，而对大清王朝的怀旧情绪则在各地滋长。同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正在鼓吹“新文化”运动，以开1919年五四运动之先

河。这个运动的要旨在于复兴民族主义，排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端郡王载漪既代表了旧式政权，又代表了排外心态，自然成为管理不善的共和国的那些新贵们的座上宾。

但是，这些新贵中的某些人对端郡王载漪的心态还不了解，有些过分热情的举措反倒使端郡王难堪。在甘肃省会兰州，某将军居然以当时时髦的西式大菜宴请端郡王。端郡王绝不肯动刀叉，明说不愿吃“洋”菜。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忍受”一下现代交通工具。到了河南境内，大车队已筋疲力尽，北洋政府为他们派了火车专列。据一直陪同端郡王的孙子毓运的回忆，小孩子们第一次坐“洋火车”都兴奋不已，既干净，又稳、又快。而老王爷则一路上闭目养神，一听到孙儿辈夸赞火车就大怒。

端郡王载漪的到来成了大新闻，京城震动。列强驻华使馆纷纷表示抗议，坚称北洋政府违反《庚子协定》。新闻记者云集王府周围，指望一睹端郡王风采，或拍上张把照片，甚至奢望得到一次采访机会，端郡王自然一概拒之。但是北京政府现在开始感到不快，京城谣言四起，说老王爷回来要发动兵变，推翻共和。几周后，曾为清廷大臣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派京城警察署长登门拜访，劝说端郡王住进中央医院，这样才好向中外说明“回京就医”的合法性，同时也可避开欲来造访的不速之客。住院期间，列强外交官还是进行了强行探视。据毓运回忆，端郡王载漪将满族长辫散开，遮住面部，端坐太师椅上一言不发。受此刺激后，端郡王决定携眷重返甘肃，徐总统如释重负，立即把原定的端郡王的流放费用提高百分之五十。

5年后，端郡王载漪客死宁夏，终年66岁，身后留下一个入不敷出的大家庭。载漪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和回忆录，这样，20世纪中国的极重要的一页也随着载漪入土安葬而掩埋了。^①

^①主要内容参照爱新觉罗·毓运：《记祖父端郡王载漪庚子被罪后的二十余年》，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总第120辑）。

目 录

1	前 言
1	序 幕——神秘的车队
1	第一章 清廷朝政的失衡
1	一、一个亲王之死
8	二、八旗权贵与汉族士大夫
11	三、南派和北派
14	四、最后的平衡招数
17	五、维新与反扑
23	第二章 失控的“洋人”
23	一、列强外交官
28	二、传教士们
35	三、冒险家们
43	四、国际地缘政治与“百日维新”
47	第三章 德国式的帝国主义
47	一、争夺势力范围与多变外交风云
50	二、安治泰主教和德国的“全球政策”
58	三、德国的炮舰政策与胶州湾事件

- 63 四、巨野教案
 65 五、中方的回应
 68 六、清廷的困境与义和团的兴起

76 第四章 意大利的戏剧性表演

- 76 一、暧昧的意中关系
 82 二、三门湾最后通牒的由来
 89 三、萨瓦戈的“戏剧性表演”
 94 四、中方的强硬态度

102 第五章 群情激愤的山东

- 102 一、义和团的起因
 108 二、德军在山东的暴行
 111 三、中国政府的态度
 118 四、列强与山东

128 第六章 中外沟通的两大问题

- 128 一、拳乱无碍大局
 133 二、公使团面面观
 139 三、中外沟通的障碍
 142 四、卜克斯事件
 144 五、公使同盟的成立
 148 六、中方的对策
 152 七、第二次联合照会

157 第七章 威胁动武

- 157 一、俄国、日本与“传教国同盟”
 162 二、列强的海军示威
 169 三、清廷重申“曾国藩原则”

175	四、直隶义和团与神秘主义
179	五、警钟重鸣
186	第八章 通往冲突之路
186	一、荣禄将军为何不露面
190	二、“团练”的重提
195	三、涞水事件
200	四、公使联席会议
212	第九章 护馆卫队进京与剿拳政策的结束
212	一、“拳乱”四起的华北
215	二、护馆卫队问题
220	三、轻重缓急的决策
225	四、黄村事件
230	五、剿拳的终结
237	第十章 走向战争
237	一、清廷与义和团的有限合作
241	二、列强海军将领与公使的关系
246	三、远征计划的制定
250	四、中方的战争准备
255	五、杉山彬事件
261	第十一章 西摩联军何处寻
261	一、义和团与西摩联军
267	二、廊坊大战
271	三、“猎取拳民行动”——黑色星期五
280	四、大乱中的天津